



大湖西（连载）

杨义堂



第二章 崇文尚武存古风

湖西地区是上古大洪水之后东方人类初诞之地，是古济水、泗水流经之所，是宋元明清时期的黄河故道，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地区，从伏羲女娲时代就是人类聚居的部落。微山湖四周有许多伏羲庙，传说中伏羲女娲从东西凫山上滚磨成亲的东西凫山、磨盘山，有一首民谣唱道：

东凫山，西凫山，
天连水来水连天，
多咱哭到黄水干，
黄水干了立人烟。

湖西有一个千年古县叫作单县，因帝舜的老师单父而得名。单父名叫单卷，因善道术、有德行，被尊称为单父。在唐尧虞舜治理天下的五帝时期，单卷和他的部落在这里渔猎、采集、耕作、生息繁衍。他很有才德，受人拥戴。尧经常来向他问政，每次来拜访单卷，都毕恭毕敬，谦虚讨教。后来，尧把天下让给了虞舜，舜执掌天下后，也拜其为师，并诚心要把天下让给他，被单父拒绝。舜再三逊让，单父极力推辞，固辞后隐入南方深山，莫知其处。

在单县老城的仙人湖畔、古护城堤上，有一座四四方方的土台子，称作“琴台”。2000多年前，孔子的两位学生先后来到这里担任单邑的邑宰，一个叫做宓子贱，一个叫做巫马施。宓子贱弹琴取乐，悠然自在，很少走出公堂，为政三年，治理得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；而巫马施在治单父的时候，他事必躬亲，一个人披星戴月，沐雨栉风，特别辛苦。二人的方法不同，但都能把单邑治理得很好，皆成了后世官员效仿的典范。

鱼台县西周时期属极国、茅国，春秋时期属于鲁国的棠邑，是孝贤闵子骞的故里，闵子骞与樊子迟、宓子贱皆为孔子的弟子，同列七十二贤，孔子去世后，弟子们一起守墓三年。之后闵子骞与樊子

迟、宓子贱三人相约到棠邑设坛讲学，从学者数百人。因他们的居所相距不过五华里，故而形成了“五里三贤”的佳话。

金乡县是夏朝时期的缙国，因为汉武帝的儿子刘髡封为昌邑王，在一座山前凿墓得金，故改名曰金乡山。金乡的鸡黍镇，是《后汉书》中记载的“鸡黍之约”故事的发生地。东汉年间，山阳郡金乡县人范式与汝南郡人张劭初识于赶考途中，范式得了重病，张劭悉心照料，范式病好了，二人遂结拜为兄弟，并约定日后重阳佳节互访尊亲，以鸡黍相待。此后多年，二人始终恪守此约，诚信不渝。然而，有一年重阳，范式因公务繁忙，未能及时启程，深感愧疚。他深知，若失信于张劭，便是对友情的背叛。于是，范式毅然决定以魂灵赴约，自刎身亡后，魂灵赶至张劭家中。张劭梦中得见范式，醒来后方知真相，悲痛欲绝，随即赶往金乡，为范式奔丧，最终亦因哀伤过度而亡。张劭、范式两位贤士重诺守信、生死之交的故事千古流传。

南部的丰县、沛县、铜山县是商周时代的丰国、沛国、大彭民国。丰县也叫凤城，相传远古时代有凤凰落于此而得名，应该是古代凤凰部落的一支在这里定居过。有“先有徐州后有轩，唯有丰县不记年”的老谚语，意思是说，在没有轩辕黄帝的时候已经有了徐州，而丰县则在没有历史纪年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。铜山位于微山湖南岸、徐州城的城郊四周，因为微山湖中的铜山岛而得名。

湖西地区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也是历代农民起义的多发地。

秦朝末年，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起义，大泽乡就是如今的安徽宿州东南刘村集一带。

汉高祖刘邦是沛郡丰邑人，他在芒砀山斩白蛇起义，带领三千家乡子弟反抗暴秦，“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”，建立了汉朝。

而另一位起义的项羽则是泗水郡下相县人，即今天的江苏省宿迁人。

这里还是黄巢起义的地方，唐朝末年，曹州人黄巢举起义旗，反抗朝廷，在这里转战沂州、郓州，势力越来越大，然后才攻取占长安。

1855年黄河大决口，鲁西南以及皖北、苏北灾害严重，农民饥寒交迫，推举张乐行为盟主，号称“大汉盟主”，发动了捻军起义。捻军骑兵纵横驰骋于皖、豫、鲁、苏、鄂、陕、晋、直（冀）八省十余年，极盛时期总兵力达20多万。他们坚持16年英勇斗争，沉重打击了清朝腐朽统治。

在湖西地区，许多村庄的人从小就练习武术，家族传承，自为师友。一为健身，二为防身，三为行侠仗义，除暴安良。

《丰县志》称此地“地临邹鲁，夙有儒风。然俗好刚劲，尚气节，轻剿急疾，虽庸下，莫肯少俯”。意思是这里靠近邹鲁，自古就有儒家君子风尚，但是民俗刚劲，崇尚气节，世世代代有不畏强暴、果敢勇毅、不肯低头的斗争精神。

可以说，在湖西这一片古老的黄土地上，每一寸土地都烙印着中华先民的足迹，且代代相承，没有间断；每一条河流都流淌着无数朝代里黎民百姓奋斗、抗争的汗水与泪腺；每一锹土挖下去，都能挖出一个个精彩绝伦、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。

湖西地区的许多县都有“天下第一家”——曲阜孔府的田庄，也有挂“千顷牌”“双千顷牌”的大地主庄园，单县著名的百寿坊朱家悬挂着金字双千顷匾，自称“出城巡游数千里，车不轧外姓的地，靴不沾他家的泥。”当然，这里也有世代佃种土地的贫农，不仅要交繁重的地租，还要无偿地为东家干活。也有穷得走投无路的贫民，借一还多，“驴打滚”“利滚利”，总是还不完那“阎王债”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故知鲁

曲阜碑刻（四十）

元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

王俊毅

元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，刻立于元成宗大德五年（公元1301年），位于孔庙十三碑亭的南面。碑文由翰林学士间复撰写，翰林侍讲刘赛正书。此碑由集贤学士刘无篆额，碑额篆书“大元重修至圣文宣王庙之碑”。碑高4.2米、宽1.8米、厚0.48米，碑座高1.02米、长3米、宽1.8米。整篇碑文共有30行，每行80字，详细记载了重修孔庙的缘由、过程、参与者。通过研读碑文可以发现，这不仅是一篇重修庙宇的记录，更是对孔子思想的颂扬。

“至圣文宣王”为孔子诸多封号之一。孔子，名丘，字仲尼，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政治家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。他的思想对中国乃至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被后世尊称为“圣人”。“至圣”意为达到了圣人的最高境界，是对孔子道德、学问等方面成就的极高赞誉。而“文宣王”则是封建王朝对孔子的加封，特别是在唐宋时期，为了推崇儒学，巩固统治，皇帝多次对孔子进行加封，其中就包括“文宣王”这一封号。此封号不仅体现了孔子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卓越贡献，也反映了封建王朝对儒家思想的重视和推崇。由于历史时期的不同和统治者的更替，孔子所获得的封号也有所不同，但“至圣”和“文宣王”是其中最为重要和广为人知的封号。

碑文开篇即言：“道之大原，实出于天。天何言哉，乃以圣传。”这句话直接点明了孔子思想的天道根源，强调了孔子作为圣人，其学说对后世的深远

影响。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（今山东曲阜），祖籍宋国栗邑（今河南夏邑）。孔子的祖上是宋国栗邑的贵族，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。其父叔梁纥，母颜氏。孔子三岁丧父，家道中落，早年曾做过管粮仓、管放牧的小官。孔子自幼熟悉礼制，青年时便以广博的礼乐知识闻名于鲁，从事儒者之业，以办理丧祭之礼为生。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，倡导“有教无类”，即不分贵贱贤愚，广收门徒，打破当时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。孔子主张“因材施教”，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教育，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，如颜回、子路等。孔子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，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道德准则。孔子主张以德治国，即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和社会。他反对暴力和苛政，提倡“为政以德”。他曾一度担任鲁国的司寇，摄行相事，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，但因与当政者政见不合而弃官去鲁。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古代文献，修订了《诗》

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经，这些经典后来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教材。孔子去世后，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，整理编成《论语》，该书被奉为儒家经典。

元朝选择追封孔子为“至圣文宣王”，这一决策背后蕴含了多方面的原因和考量。这一举措不仅体现元朝统治者对儒学的尊崇和弘扬，也反映元朝统治者在巩固统治、维护社会秩序、促进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努力和追求。儒学自西汉武帝之后逐渐成为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，其思想体系对传统社会的政治、文化、教育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。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，自然也意识到儒学的重要性。元朝是一个多民族、多文化交融的朝代，为巩固统治，元廷需要借助一种受广泛认可的文化力量来凝聚人心。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，自然成为元朝统治者的重要选择。元武宗对儒学持有较高的敬意。他标榜“溥从宽大”，大范围地封官赏赐，推行理财政策。元武宗的诸多政策反映了他巩固统治、经济调整和文化融合多方面的治理理念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元朝的稳定，从而为儒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。

元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见证，更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文化始终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。我们应该尊重并弘扬传统文化，让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。